

新中国经济建设 评 析

张寿春 金 鑫

东南大学出版社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

新中国经济建设评析

张寿春 著
金鑫

东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两位作者,长期以来分别从事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这本合作出版的专著,综合发挥了两人之所长。本书以中国经济建设为主题,根据1949年至1991年期间我国经济建设曲折发展的实际情况,分为三大段九小段作了系统的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采取史论结合的方式,既充分肯定了取得的成绩,也如实指出了发生过的失误,并且从思想、政治、经济、组织等多视角地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鲜经验。本书治学严谨,资料翔实,立论正确,结构新颖,有助于知往鉴今,增强社会主义信念,更快更好地推进现代化建设。它可以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经济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启迪,可以作为县级以上党校和高等院校经济专业、历史专业、政教专业的教材,也可以作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参考书。

新中国经济建设评析

张寿春 金 鑫 著

*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四牌楼2号 邮编210018)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京邮电学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25 字数 349 千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81050—112—7/F·12

定价:17.00元

(凡因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也是一面值得珍惜的明镜。我国正在进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历史长河的继续。不仅以往建设中的成果为当今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以往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也是不容忽视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撰写《中国经济建设评析》这本专著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系统地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40 多年经济建设的曲折历程和发展趋势,总结历史经验,作为行动的向导。

在这本书中,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方面,充分肯定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大量确凿的事实证明古老的中国已经获得新的生命力,正在以矫健的雄姿追赶经济发达国家,并且初步缩短了差距。另一方面,也不讳言发生过的挫折,包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误对经济建设的破坏。我们突破就经济谈经济的狭隘眼界,力求从包括思想、政治等影响经济发展的多种因素着眼,从纵向和横向进行多视角的比较,对它的是非得失作出恰当的评估,全面地剖析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鲜经验,以便比较准确地探索出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从而知往鉴今,为当前和今后更好更快地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些可资参考或值得警惕的启示。

回顾历史,我们伟大祖国曾经有过值得骄傲的时代。15 世纪以前,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发达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和灿烂的文化,处于世界前列,对全人类的进步作出过巨大的贡献。据 1977 年出版的《自然科学大事年表》统计:全世界重大的科技成就,在公元前 6 世纪以前一共 54 项,其中有 31 项是中国发明或发

现的,占 57.4%;公元前 6 世纪到公元前 1 世纪,全世界共 87 项,中国为 44 项,占 50%;公元前 1 年到公元 400 年,全世界共 45 项,中国为 28 项,占 62%;公元 401 年到公元 1000 年,全世界共 45 项,中国为 32 项,占 71%。到公元 1500 年止,在全世界重大科技成就中,有 58% 是中国发明或发现的。在古代世界文明史上,中国的数学、天文学长期居于领先地位,特别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等四大发明,更是举世瞩目,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是,这个曾经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丰硕成果使世界各国为之倾倒的伟大祖国,从 16 世纪起,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落后了,至今尚未实现现代化。严峻的事实不容回避,沉痛的教训更需反思。

“现代化”一词,按我们的理解,从历史的发展过程看,这是一个兼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领域的综合性范畴。现代化的实现,是一个全社会向前推进的历史过程。它的主体是要以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使社会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它的深刻含义并不仅限于此,而是要在下列五个方面实现历史性的转变:一是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二是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转变为分工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三是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四是从专制独裁转变为民主政治;五是从文盲众多转变为教育科学文化发达。也就是说,实现工业化、社会化、商品化、民主化、知识化,都是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们是一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实现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一场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

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是在资本主义阶段完成的。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 1848 年写的《共产党宣言》中作过公正的评价,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

要多,还要大。”^①可是,中国在封建社会解体以后,并没有形成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社会形态,而是沦为畸形发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然后经过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社会。从而使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只有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才可能真正开始起步。

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就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哪个个人的主观意志,而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决定的。

首先,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严重阻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15世纪末,我国东南沿海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它的发展极为缓慢。与欧洲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别。欧洲从14世纪至15世纪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后,只经过一二百年就进入资本主义时代,18世纪中叶已经开始产业革命,用机械化代替手工劳动。而我国从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以后,经过300多年的发展,直到19世纪中叶仍然处于胚芽状态。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经济内部结构十分坚固。欧洲封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庄园,内部实行分工,工商业比较容易产生和发展;同时由于土地不准买卖,从经营工商业获得的利润只能继续用来发展工商业,这就有利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形成。我国封建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特征,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业和手工业紧密结合,男耕女织,衣食自给,严重限制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提高。另一方面,也由于封建政权实行“重农抑商”和闭关自守政策,把商业作为士农工商的末业进行压制,又不了解世界发展的动向,与欧洲实行“重商主义”和鼓励发展对外贸易的做法背道而驰,因而不能吸取他国之长补己之短,严重地阻碍工商业的自由发展,在生产技术上也处于停滞落后状态。在上述政策的影响下,加上土地可以买卖,仍然是最稳妥可靠的投资对象。于是,商人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256页。

手工业主在赚钱以后,除了继续维持现有经营外,多半用来购置地产,或者放高利贷,而不是转化为工业资本或扩大商业资本,这就很难形成独立的资产阶级,没有力量从根本上冲破封建制度的桎梏。

其次,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决不容许中国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成为竞争对手。

自从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欧美列强凭借发达的经济力量和先进的武器装备,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强占大片领土,勒索巨额赔款,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铁路交通和海关,取得在中国开办厂矿企业等一系列特权,并且通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同封建势力、官僚资本相勾结,垄断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状况,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严重,连政治和外交的主权也被帝国主义所操纵。到1946年,在全国工业资本总额中,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占32.8%,中国资本占67.2%;而在中国资本中,官僚资本占67.3%,民族资本占32.7%。从总体上看,民族资本只占全部工业资本的20.3%。再就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在旧中国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来看,钢占99.8%,原油占100%,原煤占87.7%,发电量占75%,棉纱占44%,棉布占73%。可见,外国资本的入侵,虽然加速了自然经济的解体,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中国并未能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归根到底,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它们决不肯放弃在中国掠夺到的既得利益。

再次,民族资产阶级十分弱小,没有能力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中国近代史上,龚自珍、洪仁玕、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等,都曾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提出过改良或革命的思想,主张“师夷长技”以增强国力,主张依靠“富民”的经济力量来建立并发展新式生产和流通事业,主张学习西方的“新学”,仿效法兰

西共和国和日本明治维新,力图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求“振兴中华”(孙中山最先提出)。但是,他们的理想始终未能变成现实。原因是处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的夹缝中挣扎的民族资产阶级,根本无法获得充分发展的条件。在经济上,民族资本绝大多数存在资金短缺的先天不足,不得不将有限资金用于耗资较少的轻纺工业(主要是棉纺织、缫丝、面粉、卷烟、火柴、造纸、皮革、肥皂等行业),基本上没有自己的重工业作基础。民族资本一般都属于中小型企业,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因而在资金、设备、原材料、技术以及储运和销售等各个环节,不同程度地依赖于外国资本或官僚资本。直到全国解放前夕,民族资本的工业企业仅有12.3万家,职工164万人;商业企业13万家,从业人员99万人。这种经济上的软弱性,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动摇性和妥协性,因而没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力量去粉碎中外反动势力的束缚。戊戌维新的流产和辛亥革命的失败,主观原因都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不成熟分不开的。

最后,无产阶级掌握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决不允许走发展资本主义的老路。

当资产阶级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屡遭失败的时候,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中国一批先进分子受到极大振奋,重新思考救国救民的道路,决心“以俄为师”,用人类最先进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指南。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我国于1919年5月4日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从此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尤其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就逐步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经过28年艰苦斗争,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控制了经济命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当然不能再走欧美发展资本主义的老路,而是必须也有可能利用已经具备的政治前提和经济条件,

不失时机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我国没有经过独立的资本主义阶段就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首先应该肯定这种“超越”并不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而是普遍规律与中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点相结合的必然结果。它的最大好处,可以使我国广大人民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苦难,社会主义制度更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是从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来看,也要看到不利因素,突出地表现为:生产社会化程度很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文盲大量存在,国民教育很不普及;科学技术落后,知识分子很少,特别是高水平的知识分子更少;非常缺乏搞活市场和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经营管理方法十分陈旧;缺乏民主传统,法制很不健全,封建专制的遗毒时有反映。换句话说,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阶段实现的工业化、社会化、商品化、民主化、知识化等五大历史任务,旧中国一个也没有完成,而这些任务恰恰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也无法超越的。因此,当我国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开始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时候,所遇到的困难是异乎寻常的。我们在评析40多年来经济建设的是非得失的时候,不能不考虑我国国情带来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在特殊条件下探索前进的过程。

40多年来的经济建设经历了哪些阶段,也就是本书分章结构以什么为依据呢?我们没有采用通常根据社会制度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来划分的四阶段论(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划分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历史的伟大转折),也不是机械地按照几个五年计划来划分,而是依据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变化,尤其是经济建设实际进程呈现的阶段性的,把它划分为三大段九小段。

第一大段,从1949年10月至1957年,是经济建设顺利起步阶段。其中包括两个小段,分别在本书第一、二章作出评析。前三年改组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畸形的经济结构,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使工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

平；后五年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实现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总体上看，在这8年中，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集中表现为有步骤地比较稳妥地实现了我国革命性质和社会性质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成功地解决了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当劳动人民掌握全国政权以后，要不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建立起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开了一个好头。在三大改造后期，虽然出现过要求过急、工作过粗等偏差，但是在这场涉及到几亿人口的社会大变革中，生产力并没有遭到破坏，而是稳步地向前发展；人民生活并没有下降，而是得到明显的改善；还把原来的剥削者改造成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确是举世瞩目的伟大创举和历史性胜利。

第二大段，从1958年至1978年，是经济建设几经波折阶段。其中包括“三年跃进”、“五年调整”、“十年动乱”、“两年徘徊”四个小段，分别在本书第三、四、五、六章作出评析。在这21年中，我国开始全面进行现代化建设，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了大量的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农田水利建设，创立了化学纤维、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新兴工业，建成了一大批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成功地进行原子弹和氢弹试验，发射并回收了人造卫星，进一步奠定和充实了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但是，在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急于求成和盲目求纯的“左”倾指导方针的严重干扰，曾经发生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洋冒进”等三次大的挫折。

我国从1958年起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由于对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成熟程度及其发展规律认识不足，更由于在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滋长了骄傲情绪，不切实际地提出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品产量方面用10年左右时间实现“超英

赶美”的战略目标,并且力争早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以致一开始就带有盲目冒进的色彩,使得从1956年着手进行的建设道路的探索由正确转入失误,抛开了中共八大通过的“二五”计划的建议和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从微观来看,确有不少工厂是在这时上马兴建的,对加速我国工业化的进程,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从宏观来看,“大跃进”运动并没有实现经济建设的高速度发展,而是一场主观蛮干的盲目冒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与“大跃进”同时发动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急于过渡的产物,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破坏作用。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前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经济技术合同,我国在1959年到1961年连续三年发生严重困难,国民经济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负增长。

1961年至1965年是经济调整阶段。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从1961年起不得不改变经济发展战略,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新方针,把过高的经济指标降下来。经过两年调整,经济状况仍未好转,只得暂时中止经济建设的中期计划,继续进行三年调整。由于方针正确,措施得力,1963年国民经济从“谷底”稳步回升,1964年经济形势全面好转,到1965年底,国民经济调整任务胜利完成,重新出现了比较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1966年至1976年这一小段,横跨三个五年计划。由于受到错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猛烈冲击,加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都被打乱了。也由于对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估计过头,国民经济实际上被推上了以备战为中心的战时经济轨道,三线建设步子太急,影响了其他建设的进行,造成很大的浪费和后遗症。在这期间,尽管1972年周恩来狠批极“左”和1975年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使经济建设两度出现转机,但是由于“左”倾指导方针始终居于支配地位,国民经济呈现畸形发展状态,并且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经历了曲折的过

程,降低了发展速度,重大比例关系又出现严重失调。

从1976年开始实施“五五”计划。由于不久即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动乱,全国形势好转,国民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对十年动乱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恶果估计不足,对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缺乏认真的总结,经济工作中继续贯彻了脱离国情、急于求成的“左”倾指导思想,片面强调“大干快上”,继续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高积累,企图搞新的“大跃进”,从而又发生以“洋冒进”为特征的错误,进一步加剧了比例失调和经济困难。1977年和1978年的两年徘徊,是“左”倾错误余波造成的危害。

纵观第二大段的21年,成绩与失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已经取得的成就,为进一步开展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具有相当规模的物质技术基础;多次出现的失误,也是进行科学反思不可忽视的精神财富。

第三大段,从1979年到1991年,是经济建设蓬勃发展阶段。其中包括“稳步前进”、“高速发展”、“求稳减速”三个小段。本书第七、八、九章对这三小段分别进行评析。自从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以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且把拨乱反正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从而使经济建设发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转变。这13年,是真正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13年,是不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13年,因而成为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

其中,1979年至1983年的五年,虽然跨越两个五年计划(前二年属于“五五”计划后期,后三年属于“六五”计划前期),但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来看,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它的主要特点是拨正航向稳步前进。随着全党和全国工作重点从抓阶级斗争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轨道上来以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政策也拨正了方向,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方针,使国民经济终于摆脱“左”倾错误的羁绊,扭转了多

年来的不稳定状态,取得了许多具有新的特色的成就,对后来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4年至1988年的五年,前两年属于“六五”计划后期,后三年属于“七五”计划前期,在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中,又构成了一个小的阶段。它的主要特点,是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方面都有新的突破,经济体制的格局发生了很多重大变化,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国民经济连续五年出现高速发展的良好态势,上了一个大台阶。

1989年至1991年这一小段,同样跨越两个五年计划,前两年属于“七五”计划后期,后一年是开始执行“八五”计划的第一年。它的主要特点,是针对前五年高速发展后期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经济秩序混乱等问题,经过三年治理整顿,以及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为经济建设创造了比较良好的环境。但是,在治理整顿过程中,一度出现过多地采用行政手段,向旧的管理模式复归的倾向,过于求稳,降低了经济发展速度,企业经济效益滑坡等问题也未能根本扭转。

在上述连续13年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上,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发表重要谈话,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要求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经济,力争隔几年再上一个台阶。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完全赞同邓小平的重要谈话。接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决定。以邓小平谈话和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里需要进一步阐明我们关于三大段九小段划分法的根据和理由。

把建国初期的三年恢复作为一小段,这是早有定论。把1953年到1957年执行“一五”计划作为一个完整的小阶段来考察,更容易看出全貌和总结经验。过去有些著作把1956年和1957年分别

加以评述，主要是因为中间夹了一个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引起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化。从经济建设过程的角度来看，就没有必要把前四年和后一年分开评价了。

我们之所以把1958年到1978年划为一个大段，决不是笼统地予以全盘否定，而是因为这21年的内容有着紧密相联的承续性。在这21年中，经济建设先后进行了从“二五”至“五五”四个五年计划，取得一定的成绩；而发生的几次失误，尽管程度和形式有所不同，有时直接反映在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而造成重大损失，有时着重表现为剧烈的政治动乱对经济建设的冲击，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其错误性质是一脉相承的，都是由“左”倾指导方针造成的。即使像“文化大革命”这样激烈的政治斗争，实际上也是围绕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和建成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展开的，是前十年探索建设道路过程中的分歧引起的，其消极影响也必然在经济建设上强烈地反映出来。因此，把它同前面的两小段划在一个大阶段中考察是合乎逻辑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出现的两年徘徊，尤其是“洋冒进”的发生，从指导思想到基本政策和做法，都是承袭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错误。把这两年划入第二大段，也是合情合理的。邓小平曾经指出，从1957年下半年起，“左”的错误延续了20年。陈云也讲过，在这20年中，“左”倾错误是经济工作中的主体性错误。这些重要论断，对于怎样正确认识1958年至1978年这段历史，是很有启发的。同时，把这21年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过程来考察，也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转折的重大意义，以及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必要性。

至于1979年以来的这一大段，我们没有按照几个五年计划来分小段，也是本着尊重历史事实，更好地反映经济发展本身的阶段性。当我们全面地系统地研究这一段历史以后，特别是读了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以后，为了更好地弄清1984年到1988年为什么会出现一个高速发展阶段，因而把这之前的五年和治理整顿

的三年一并划分为三个小段,这就更有助于总结经验教训,予人以启迪。实践证明,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作指导是不行的。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从来都不可能完全按照五年计划的预想来进行。这也要求我们必须以经济建设实际进程的阶段性作为评析的客观依据。

最后,说说这本书的写作特点。从书名可以看出,本书的着眼点是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有系统地又是分阶段地作出评析。既然是叫“评析”,也就决定这本书的写法特色。它不是单纯的经济史,也不是常见的中共党史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而是博取众长,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做到既“评”又“析”。本书的第一章至第九章是全书的主体。每一章又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一定阶段的经济建设发展情况作出评估,特别是注意同其他阶段的比较中反映出它的特点;第二部分是采取史论结合的方式,分析该阶段取得成就或发生失误的原因和经验教训;第三部分是深入一步探索前进中的不足或逆境中蕴含着发生转机的因素,以便与后一阶段相衔接。这样把每一章的三个部分连贯起来,就可以看到多年来经济建设曲折发展的全貌及其原因,从中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除了上述九章以外,前面写了绪论,主要阐明旧中国十分衰败的物质技术基础,以及认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是在什么样条件下开始起步的;同时也写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主革命过程中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理论准备和政策准备,以及解放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全书最后的结语,主要是写40多年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和发生曲折的经验教训,以及根据中共十四大精神,阐明了抓住时机、加快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本书暂时写到1991年为止,1992年开始的新阶段,留待以后再来续写。

本书是作者多年来分别在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张寿春,中共党史教研室教授)和南京中医学院(金鑫,社科部副主任、讲师)从事教学和科研的结晶。其中,金鑫撰写第二、四、九章。我们虽然在资料收集和理论研究上作了较长时期的准备,但到了动笔的时候,仍

然感到知识和能力的不足,因此,书中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马克思说得好:“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①毛泽东也说过:“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②我们正是在革命导师的教导激励下,发扬不畏艰难勇于攀登的精神,才写出了这本书。究竟写得质量如何? 恳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1993年2月20日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26页。

② 《毛泽东诗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31~132页。

目 录

前 言

绪 论 基础衰败及早准备·····	1
一 旧中国贫穷落后的物质技术基础·····	1
(一) 旧中国缺乏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政治前提 ·····	1
(二) 工业结构畸形技术基础很差 ·····	2
(三) 以农立国民不聊生 ·····	4
(四) 交通运输遭到严重破坏 ·····	4
二 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理论政策准备·····	6
(一) 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及其经济主张 ·····	6
(二) 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萌芽 ·····	8
(三) 制定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 ·····	12
(四) 规定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蓝图和基本政策 ·····	14
三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 ·····	24
(一) 农村革命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 ·····	24
(二) 抗日民主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 ·····	27
(三) 解放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进一步扩大 ·····	29

第一编 经济建设顺利起步

(1949 年 10 月至 1957 年)

第一章 国民经济迅速恢复(1949 年 10 月至 1952 年) ·····	33
一 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 ·····	33
(一) 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	33
(二) 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得到根本好转 ·····	36